

## 郁郎国传奇

■ 王银

周武王姬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继承了他父亲周文王的王位后，又把他的顶头上司封赶下了台。并建立了继商朝之后的又一个奴隶制王朝——周朝。

周朝建立后，为控制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周武王分封姬氏宗亲和功臣为列国诸侯，分封的实质是：按血缘关系，分配政治权利。周武王的弟弟叫姬旦，姬旦的儿子叫姬伯禽，姬伯禽被他大爷周武王封于鲁，姬伯禽被称为鲁公。鲁公的封地即为鲁国，鲁国的国都是曲阜。鲁国先后传二十五世，经三十六位国君，约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鲁国传到第十五代国君鲁隐公的时候，是公元前722年。这一年的春天，鲁隐公派他最信任的人姬费伯来微山湖考察。姬费伯在微山湖考察期间发现了一块沼泽湿地，这里不但草木茂盛、有山有水，而且还经常有野兽出没其间。姬费伯心想：这样一个山清水秀、物华天宝的地方，如果能建一个狩猎的场所，该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于是姬费伯把他的想法告诉了鲁隐公。

姬费伯的这个想法，得到了领导鲁隐公的同意。根据其功能和政治地位，鲁隐公命名这个地方为郎圃。按《古汉语大词典》解释：郎，从邑，表示与行政区域有关；圃，养动物的园子。《左传》载：“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四月，费伯率师筑郎城”；明万历《滕县志》载：“盖圃郁声讹，今俗呼为有，士人呼郁郎，一呼有郎，皆圃字之讹也”。

姬费伯在得到鲁隐公的财政拨款后，连夜赶到微山湖畔，为了郎城的修建早日完工，姬费伯三年没有回一趟家。

郎城建成后，鲁国的国君和“贵族们”前来狩猎、游玩，大家都对这里的旅游环境赞不绝口。鲁隐公也非常高兴，对姬费伯赞赏有加，封姬费伯为郎邑食客。姬费伯的子孙在郎城定居后，以邑名为姓，世代相传姓郎。

郁郎是鲁国的一个下邑，没有政治地位、没有军权。随着郎圃的名气越来越大，郎圃的建设越来越完善，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自然成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相互争夺的地方。为了应付突如其来的战争，郁郎逐渐有了独立的部队。有了独立的部队以后，郁郎国作为鲁国的一个附庸国而存在。传说，郁郎国的国土面积最大的时候，以郁郎为中心，向西延伸至现在的古运河边。又传说，现滕州滨湖镇驻地岗头村是郁郎国练兵的地方，奎子村是郁郎国的兵器库，稻屯村是郁郎国的粮库。

据史料记载：郁郎国存有300多年的历史。郁郎国虽小，但是这里区位优势，交通发达，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有记载的四次诸侯国之争都发生在这里。

沧桑巨变，事过境迁，郁郎国现已变为村落，隶属于滕州市滨湖镇。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仙坛山为沂蒙余脉，在京杭大运河之北群峰之中海拔不算是最高，但之于鲁南峰地却是地地道道的“名山”。峰地无论是缙、承、兰陵时期，还是后来的峰州、峰县，历史上曾“三改城垣”，始终不离其左右，在注重风水的封建时代，作为“镇邑之山”，充分说明了这座山的重要。

远古时，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当淹没着它的水渐渐退去，在水去陆显的那一刻，东西南北突然飞来千只天凤，盘旋栖落于山顶，于是仙坛山便有了“千凤山”的美名。

关于“仙坛山”名字的由来，在当地有两种说法。一是传说古人修道时选中此山设坛，历经数年修炼，终乘鹤而仙去，因而山峰上仙气不断，被乡人奉为神明。至今每到夏日，悠然的雾气飘在山顶，乡人便互相告知，雨马上就来了，因为“坛山戴帽，雨要来到”是乡人们世代代代总结出来的农谚。二是因名于历代地方官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山下设社稷、神祇、先农三坛祭祀天地、山川和五谷之神。无论是神怪传说，还是野史杂记，均为“仙坛晓翠”成为“峰县八景”之首蒙上了神秘的色彩，加上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的积淀，使“仙坛山”的名字不胫而走，而且愈来愈焕发出时代风采。

“坛山腰里三道箍，不出娘娘出都督”。智慧的乡人总能给自然风物以合理的想象。仙坛山为青石山，造山运动的遗迹给大山留下了三道明显的印痕，因此，又叫“玉带山”。山左姑嫂诸山逶迤而东，山北裴山如仆侍其而后，山右白马诸山随其而行，山南天柱诸山屏其而前，唯仙坛山“体端峰秀，形如华盖，植被葱郁”，俨然是端坐着的“腰

## 乡关寄情仙坛山

■ 孙忠强

缠玉带的谦谦君子”形象，被堪舆家奉为大福大贵之地，必能“地灵人杰”。

果不其然，数百年来，峰地确也出了“娘娘”和“都督”。明代永乐皇帝的朝鲜族妃子权氏，伴驾亲征，凯旋途中香消玉殒，御用的风水先生看中了仙坛山西的一块宝地，给峰地留下了“娘娘”的遗骨。明代隆庆年间，居于冠石石榴园腹地的贾泉村，走出了“乡试省魁”的一代高风贾三近，以文功武略，被举荐为“兵部右侍郎”（俗称“都督”）。

据地质学家考证，仙坛山的山体为海相沉积岩，在数百年前的造山运动中，分三次浮出水面，在逐步抬升的漫长岁月里，被海水冲刷出三道“玉带式”的印痕。沧海桑田的变化，三道褶皱叠印出了大自然的神奇魅力。

仙坛山又是远近闻名的文化山。元代王通曾到仙坛山吊古，留下了“今日吊古迹，俯仰今古同。万事滚滚来，过眼烟云空”的历史长叹。明代陈尔昂题《兴国寺》留诗云：僧去云随衲，人来石作床。明代滕县文人龙为党造访仙坛山，慨叹“白云山径远，黄叶寺门深”。我的文友康亮先生当下又秀出新章：郁郁葱葱林成海，闲将云气望蓬莱。清风明月本无主，山门始终为君开。

仙坛山现已是省级森林公园，成为人们登山揽胜，健身休闲的好去处。山后的温泉小镇，山前的仙坛苑广场为仙坛山坡上了时代的新装。

曾是一片菜地的仙坛苑，经城市建

设者妙手改造，成为小城人的“会客厅”，喷泉、花架、绿地、画廊、大屏幕电视装扮着现代生活。仙坛苑周边的府顺花园、凤鸣山庄、辰睿首府在大写着小城的历史高度。沿坛山路边的八根大理石龙凤抱柱，“势承九重天，力注一方土”，巍然耸立，吉祥无比。夜幕中的仙坛苑华灯璀璨，歌乐阵阵，造型变幻的喷泉“漫将天雨向人来”，激情绽放中，演绎着绚丽多彩的盛世景象。

有山必有水，这就如自然界阴阳乾坤一样均衡对等，和谐共生。如果一定要把仙坛山比做“伟男子”的话，那么那源自沧浪而来、相托相拥的承水河便是“奇女子”。承水河不断舞动着身姿，搅起风霜雨雪来装扮着这一方土地，与顶天立地的仙坛山一起书写着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共同养育着这一方百姓……

大山的性格，水样的情怀，刚毅中蕴含柔情，朴实中不乏浓烈，是为峰地百姓最显著的性格特点。乡人们在力田的同时，崇文尚武之风浓厚，“耕读传家”被诸多名门望族奉为家训。

仙坛山雄居于苏、鲁、豫、皖四省边联，界于徐州、临沂两大名城之“黄金分割点”，北秉齐鲁风韵，南承楚汉精华，南北文化交相辉映。峰地汉、回等多族杂居，风俗迥异，却能相融并包，儒、释、道百家争鸣，不仅酿生出风格独具的将相奇才，更塑造出标新立异的乡土俊杰。山门牌坊右侧，安葬的便是峰地早期的同盟会烈士张文源先生。

## 趣话民间医学奇书

■ 胡鹤鸣 岳红

刘子衡先生是上世纪中叶的齐鲁名人，一生勤于经史研究，著述甚丰，以“析证诸子，衡量百家”自命，在国学界享有崇高威望。然而，先生晚年却对一本民间医案青眼有加，他索求善本，工笔抄录，考证注释，直到逝世前仍念念不忘于心，并以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的身份，嘱托省中医学院，整理刊行。该书便是成书于清乾隆年间，在鲁西南民间传为奇书的《孔氏医案》。

1988年该书由山东中医学院委托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山东中医学界引起极大反响。但是许多医学家在惊叹奇书之余，却对此书成书经过及著者情况不甚了解。为了解此疑团，笔者专门查阅《山东通志》、《山东中医药志》、《滕县志》、滕县大家族谱、鲁南文史资料等大量书籍，对《孔氏医案》考证如下，以飨方家。

首先，孔继葵、杨黼与《孔氏医案》。《孔氏医案》作者孔继葵(1748—1820)，字涵甫，号云澗。孔子67代孙，滕州(滕县)人氏，乾隆丁酉年(1777)举人。《孔氏医案》编撰者杨黼字静存，嘉庆戊辰年(1808)进士，鲁南名士。孔杨二人都是儒医兼修的奇人，才略相当，意气相投，文才和医道具臻化境，民间流为传奇，称作神医。据《清史稿》记载，鲁西南一带在乾隆年间曾多次流行伤寒瘟疫，死者甚多。孔、杨二人以救世济人为己任，精研《金匱》、《伤寒论》等书。特别是孔继葵，甚至放弃了科举路，专攻《伤寒论》，竟然“别有神悟”。当伤寒肆虐“死者枕籍、医者束手”的时候，他查考古今医书，精心配制了药剂，使数以千万计的人得以活命，人们称为“八仙活命饮”。也获得“神医”、“灵仙”的称号。更为可贵的

是孔继葵为人看病时，精研病理，发幽阐微，效仿汉时苍公，详记病案，“书其原委收其得失之验”。日久积多，便成为极有价值的案头巨牍。后来，孔继葵精选其中90篇题名《医鉴草》，又名《一见草》即《孔氏医案》。孔将书稿送杨黼审阅。杨看后认为“以韩苏之笔，发岐黄之论，警快绝伦”，给予极高评价，并劝他刊行于世。便慨然相助，自出资金，亲为修改、整理并作序，于嘉庆十五年(1810)出版，题名《医鉴草》。全书分四卷九十案，约十余万言。

《孔氏医案》的版本及流传。据考证，迄今为止，《孔氏医案》共有四种版本：嘉庆十五年(1810)，杨黼先生为出首版，印量有限，除一部分赠与亲友、同道外，据说被一徽商购去，带到江南，曾在江浙一带流传。孔继葵的儿子，因其父虽为“神医”却一贫如洗，无遗留财留给子孙，愤而毁其遗书。因而，倒是孔氏家乡一带在晚清对《孔氏医案》只传其名，不见其迹。第二种版本是嘉道年间抄本，字迹工整，颇有章法，但仅收医案82篇，序文署名是沛县叶凤翠所作。第三种版本是民国21年(1932)，题名《一见草》，仍为82篇。第四种即刘子衡大师之手抄本。抄本采于何处无从考，但刘大师奉为至宝。当时虽已高龄，且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仍不辞劳苦，工笔抄录全篇医案，字迹工整，清晰如刻，并有著名书法家陆维钊先生的跋语和题鉴。

《孔氏医案》的价值。作为一种民间著述，初为自赏之作，而不想鸣于世，后来却自发传承，深受医家推崇和学者青睐，究其原因，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精深细密、点石成金的学术价值。《孔氏医案》很像前清中医名家喻昌的《寓

意草》，都是倡导先论病机，再定治法。但《孔氏医案》更向前迈进了一步。孔继葵作为儒医，更锐于论病，他注重的是技法与医道，细节与过程，循理法、察变化。主张治病施治循因求果，但不泥古法，对各种复杂变化的病症，都能“详细分析其纤毫之微，以其平衡阴阳，协调升降，以配天地气机之变化”。在医案中多次提到遇有疑难病症，孔继葵与杨黼互相推论论证的例子。二人都精通《内经》精义，“神医”大名各擅一方。孔料病周详、谨慎；杨见识精辟，一针见血。但二人不执己之见，共议病机，入精入微，见仁见智。许多疑难病症都是二人共同研诊看好的。同时孔谦诚求实，对成功的经验客观分析，对失败的教训和失误也坦诚以告，认真总结。二是济世救人的儒医精神。杨黼《孔氏医案序》通篇盛称孔氏为“儒医”、“良医济世”，此言不虚。孔继葵“少负奇才，肆志经史，欲经论字内”，并于29岁中举人。但当时“瘟疫横行，危殆者多”，他亲见“医者各见所见，于病若未见也”。于是抱定济世救人之决心，弃儒从医。不到数年，成为驰名苏鲁冀三省之“神医”。他成名后，并不以此渔利，而是汲汲于治病救人。他为贫人治病从不收钱，为富人治病遇有馈赠，则劝其做功德济世人。虽一生“全活人甚众”，却自守清贫一生，所谓“臣门如市，臣心似水”，真有古儒之风。先生到死一贫如洗，死后由曾为救治过的病者数百人捐资修坟建墓。故而杨黼先生赞叹：良医济世，岂在先生乎？三是《孔氏医案》文笔精湛，语言流畅，结构严谨，析理透彻，叙事引论，生动活泼，是医古文中的佳作。孔继葵科举到举人，博学多才，诗文功底深厚，尤其古文方面他摒弃八股文风，刻意于秦汉诸子及柳宗元、王安石笔法，与桐城派南北呼应，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此而言，《孔氏医案》也是一部极有文学价值的古文力作。

综上，《孔氏医案》虽为一民间医书，但其弥足珍贵的学术价值和闪耀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儒医精神将是不朽的。

